

新中国成立初期妇女表彰与妇女动员*

张彦青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通过表彰先进妇女,鼓励更多女性从家庭走向社会,充分挖掘并激发广大妇女群众“潜能”与“动力”。这一表彰机制以劳动为核心导向,涵盖选树典型、仪式表彰及舆论宣传等环节,构成一个有效的激励闭环。荣誉表彰不仅有效激发了广大妇女对“劳动光荣”的深刻情感体验和价值认同,而且唤醒了她们的主体意识,促使她们将个人奋斗与国家建设紧密结合,将个人“为国奋斗”的认同感转化为积极行动,在实现自身不断解放的同时,推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关键词]妇女表彰;劳动;妇女解放;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24)08-0061-09

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发展与国家建设步伐紧密相连,广泛动员妇女参与社会生产,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展国民经济、建设新社会的必然要求。一方面,把妇女团结起来,参加生产和政治运动,能够改善她们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1]进一步推动妇女解放;另一方面,妇女在各行各业中勇创佳绩、

建功立业,撑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半边天”。在团结妇女并动员她们参与生产和政治运动,增强社会主义建设力量层面,荣誉表彰作为一项重要的治理机制,发挥了以点带面、以先进带动后进的重要作用。通过妇女荣誉表彰形式、途径、影响等历史梳理,能更深刻理解妇女表彰如何作为一种催化剂推动妇女自觉自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特色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的作用研究”[20CKS032]阶段性成果。
作者:张彦青,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教育部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上海大学)特聘研究员。

让她们在实现自身不断解放的同时,推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一、解放与动员:妇女表彰的前提根基

妇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以及新中国建设各项事业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妇女解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标识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关心妇女问题,深入剖析妇女受压迫的社会根源、妇女解放的条件和道路,认为男性对女性的奴役是阶级压迫母胎下的自然产物,^{[2](p.63)}而非源于生理差异。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出现,导致性别分工的固化和社会关系的不平等,表现为作为工厂劳动力的剥削、家务劳动的无偿化以及法律、风俗等对妇女权益的限制,妇女陷入私有、弱势与压迫的工具性循环之中。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把妇女从私有制被物化的依附和支配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指出,“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3](p.59)}他主张推动妇女广泛参与社会生产劳动、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等一系列措施,来实现妇女彻底解放,社会生产将提高被解放妇女的收入与地位,创造出全新的精神存在。^{[2](p.88)}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妇女解放视为通向全人类解放道路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在实践中,妇女被视作不可或缺的政治和经济力量。苏联是世界上首个赋予妇女选举权的国家,确保妇女在法律上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推动婚姻、劳动、教育等一系列法律改革。主张妇女积极参与政治生活,担任公职、参与决策等,

成立如“无产阶级妇女国际”等专门妇女团体,保障妇女权益。引导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工厂和其他工作岗位,以此获得经济独立,提升社会地位;发展公共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社会服务设施,使家务劳动社会化以减轻妇女家庭负担,让她们可以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发展自身。

中国共产党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和苏联的实践,陈独秀的《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李大钊的《战后之妇人问题》《妇女解放与Democracy》、李达的《女子解放论》《社会主义的妇女观》、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揭示了挣脱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束缚的妇女是社会生产的重要力量,与男性一样。党的二大明确指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亲身参与组织和指导妇女工作,推动妇女教育普及,发表文章、演讲、组织活动等进行理论传播,影响和激励了一代妇女投身革命与社会变革,鼓励妇女积极参与社会生产。在旧中国,以妇女劳动为耻的旧观念旧习俗广泛存在,但在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确立了女工农妇为主要力量的发展方向,使之融入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革命浪潮,中国妇女与革命紧密融为一体,是推动社会变革、实现民族振兴的伟大力量。在苏区,妇女群体在群众斗争、经济战线、文化战线、军事动员都表现出英雄姿态,取得伟大成绩。^{[4](p.81)}在晋察冀边区,不少妇女走出家庭,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和手工业、副业生产建设以支援前线。在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妇女成为伟大的后勤兵,为解决解放军的军需供给作出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中国的妇女是一支伟大的人力资源。

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5](p.476)}解放妇女,鼓励并推动广大妇女参加劳动,成为革命和建设的新生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实践,更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恢复和发展经济与社会生产最切实可行的路径。这也意味着,妇女只有走出家庭,寻求在社会分工中的“角色”突破,才能迈向社会解放的新阶段,在劳动中践行社会主义价值,增强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只有当自身解放与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总目标融为一体,妇女方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形势严峻,工业底子薄弱,有效劳动力尤其是工人阶级数量相对较少,成为当时生产建设的严重掣肘。据统计,全中国产业工人不过300万,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大约30万。^{[6](p.46)}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全面铺开需要广大劳动者投身其中。根据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女性人口占劳动年龄内总人口的46.8%。^{[7](p.230)}新中国建设的实际需求,决定了占有有效劳动力近半壁江山的妇女群体需要成为劳动者投身伟大社会革命。动员和组织广大妇女群众积极参加劳动生产,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妇女生活和提高妇女的地位,是人民掌握政权以后进行妇女工作的方针。^{[8](p.287)}“妇女干部第一个任务就是解决让一切多少可以从事劳动的妇女走上生产战线,一同解决生产的大问题”。^{[9](p.111)}站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新起点上,妇女参与国家建设,成为“走上前的新生力量”,其解放的必由之路鲜明地指向劳动。党和国家鼓励更多妇女投身社会主义农工业、工商业生产的建设洪流。由此,在一些长期被男性垄断的职业中,出现了女性的身影。

党和国家赞誉中国妇女勤劳、聪明、能干,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10](p.369)}顶起了社会主义建设“半边天”。1956年时,约75.6万个合作社社长、副社长有70%—80%是女性,大约50万人。到1957年,全国参加农业集体生产的妇女达1.2亿多,农村妇女参加生产的比例从解放初期的20%提高到70%,城市对女职工的吸纳从60万人提升到328.6万人。1959年,农村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总数也超过90%。^[11]同时,女职工的就业领域明显扩大,从传统纺织纱线到生产工厂中也有女工存在,到1959年时数字已经翻了一番有余,达到800多万人。^{[12](p.159)}

这段峥嵘岁月留下了丰富史料和案例,记录了党和国家团结带领妇女并动员她们参与生产和政治运动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领导的妇女工作取得很大成就,妇女群体被充分动员起来。党和国家对积极投身建设的妇女进行鼓励、肯定、表彰,如“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树立起新中国第一位女火车司机、第一位女拖拉机手等标杆,等等。先进妇女在为国家建设做贡献的同时,也带动广大妇女开辟了参与劳动的新路径。这些成为今天观察党和国家动员组织妇女的有益视角。在党和国家组织群众、发动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荣誉表彰与典型树立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做法,长期被视作“应然”。这一“应然”中实质蕴含一个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为什么荣誉表彰是有效的?具体来说,即运用荣誉表彰的治理方式,如何鼓励并推动妇女自觉走向劳动。厘清这背后的机理,对理解过去和指导未来妇女工作、发挥妇女力量具有重要意义。

二、示范与行动：妇女表彰的历史实践

设立荣誉表彰是一种具有工具理性的制度安排,是对个人或集体为国家和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褒奖与肯定。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劳动者的荣誉表彰从价值立场、社会影响上自然会比其他类型荣誉影响力要大得多。在党和国家组织群众、发动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每一种荣誉典型的选树作为一道独特的“政治景观”,都被深深打上社会主义烙印,如“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等表彰无声阐释了党和国家方针政策,铭刻了时代精神、社会规范、政治主张。

第一,确立妇女表彰的最高国家荣誉。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国家并未专门设立妇女表彰荣誉,而是作为劳动者的“子集”,泛化为生产领域中的先进个人与集体,归于劳动模范表彰一同进行。1950年9月召开的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在评选表彰中特别注意妇女的推选,表彰了37名女劳模,起到了典型示范作用。1955年9月,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召开,鼓励青年加入社会主义建设大军。1956年4月,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召开,号召开展生产运动,克服困难,提高劳动生产率,让先进生产者运动在广大职工中广泛持久开展下去,有556名妇女代表出席这次表彰大会。1959年10月,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召开,大会踊跃出

700多位女英雄。1960年全国文教群英会,在全国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等方面展开新的“文化革命高潮”。新中国第一位女火车司机田桂兰,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17岁当上全国劳模的生产互助组组长任焕孩,纺织工人代代传颂的楷模赵梦桃,“农业学大寨”中的大寨铁姑娘队队长郭风莲,等等,她们的身影就出现在这些“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先进生产者”的表彰队伍中。1960年,在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设立五十周年之际,全国妇联举办社会主义建设各条线上的先进妇女人物和集体表彰大会,即第一次全国三八红旗手(集体)表彰大会,将授予对象范围聚焦于妇女,涵盖妇女生产、模范家庭树立、妇女干部工作等方方面面,使模范榜样的示范作用更具针对性。获表彰的6305名先进妇女和3697个以妇女为主的先进集体绝大部分是在社会集体生产、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先进生产者。每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后的表彰活动,都成为妇女群体的一项重要政治生活。此项表彰无可厚非成为代表妇女获得的最高国家荣誉。

第二,形成严格规范的多种推选程序。党和国家对妇女表彰的对象经由严格的程序自下而上推选完成。采用适合本地的方式推选出劳模。有地区以群众普选的方式进行,更加郑重地进行评选,真正做到将群众公认与拥护的代表选举出来,主要城市应尽可能召开劳模会议,经由群众选举通过,保证所推选的劳模代表是真正为群众公认与拥护的,并且是经过产生劳模所在单位的职工群众的民主讨论。^①也有地区采用生产竞赛的推选方式,在以竞赛

^①参见《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全国工农兵劳模代表会议的补充通知》,上海市档案馆C1-2-220-6;《关于召开全国劳模代表会 全总发出补充通知》,《人民日报》1950年8月13日。

成绩择优选择参会代表的同时,也带来其他正面外部效应——开展生产竞赛相关省市的较大单位都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在推选创造新纪录的先进生产者参会之余,更是带动全市范围的生产热情以及生产能力的提升。“三八红旗手”的推选更是倡导“人人树雄心,个个立大志,争取成为红、勤、巧、俭的社会主义劳动妇女”,明确了思想红、工农业生产技术先进、文化水平高、团结群众的评选标准。^[13]无论是何种推选方式,一套严格、规范的推选规则,一次自下而上的推选动员确保表彰对象的广泛代表性,与基层的深度参与,拓宽了荣誉动员的覆盖面,使妇女劳动光荣的观念深入基层,得到全面理解和响应。群众对评选出来的代表都无限热爱和尊敬,在工厂、农村,到处都洋溢着群众的热烈欢呼和掌声,基层一线妇女被看见、表彰,增强了表彰对象的代表性和荣誉感,以及表彰的社会影响力。

第三,举办庄严容重的各类表彰仪式。全国妇女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和三八红旗手等表彰仪式被安排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场外旌旗招展,鲜花、红毯,耀人悦目;场内布置崭新的金会徽、红黄彩绸、高悬的宫灯、鲜艳的花草。这些光彩映衬着那一队队进入会场的英雄模范们,积极向上的劳动精神在以红黄为基调的会场布置下得以充分诠释、相得益彰。^①党和国家领导人坐在圆心位,胸前挂着大红花和红条的英雄们同扇形一般散开围绕主席台而坐,寓意“一心向党、一心为国家”。受到表彰的妇女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50年获表彰的先进妇女生产者向毛主席献旗、献花、献礼,并收到纪念册和纪念

章、两张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亲笔签名的领袖像。^[14]1953年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模范代表杨富珍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周总理与她握手时嘱托“今后全国人民的穿衣问题就靠你们了。”^{[15](p.142)}1956年的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有幸与主席握手的裔式娟,总觉得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鞭策她前进,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在生产上作出成绩。^{[16](p.29)}表彰仪式也特别安排了妇女榜样发言环节。新中国第一位机车女司机田桂英、第一位女拖拉机队队长梁军、护厂模范赵桂兰、云南丽江县妇女劳动模范和国秀、青岛中纺三厂女工陈淑德等发表劳动感想,与会妇女代表深受感染和激励。上海纺织工人代表钟明月说:“过去封建社会中,妇女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今天完全不同了,这次我在大会上看到了许多女英雄、女模范,如田桂英、赵桂兰等,她们的事迹告诉们,只有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妇女才能翻身。我不但要保证自己,而且推动我的一个组,推动全体来胜利完成各种工作任务,在完成各种生产建设任务重带领出更多英雄和模范”。中国棉十一厂的劳模代表王惠英说:“我感到工人的地位是和以前大不同了,什么事都有我们自己的份,厂里任何事我们都可以提意见。活做得好,就受到表扬。像我车上次布出得最少,扯了红旗,还选上了劳动模范。厂里的领导人非常看重我们工人,上星期纱厂工会还带了水果点心来看望我们,真叫我感动得流下泪水。我想一定要积极的做生活(上海方言,表示工作的意思),不然我拿什么来感谢他们呢。”^[17]1960年起,表彰仪式更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等转播,让人们第一时

①大会现场根据1950年9月26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的照片进行文字描述还原。

间通过收看收听电视广播,真切感受国家崇尚劳动、尊重妇女的热烈盛况。每一位先进妇女走向社会焕然一新的形象,再一次强调新中国女性在现实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指引更多妇女的发展方向。为国家、为个人幸福奋斗的伟大事业,需要涌现出更多具有诚恳、严肃、自我牺牲精神的新英雄。

第四,塑造全时空立体化的宣传矩阵。我们党在革命时期就逐步积累起借助教育、影视、报刊、文学等各类媒体宣传的经验,获得人民对新政权的支持和认可,推动建构新的社会主义共同体。表彰仪式结束,热血沸腾群情激昂的表彰效应迅速转化成立体宣传的有效资源,各类媒体扩大传播声势,着重树立妇女群体敢为人先的劳动形象,鼓舞人心。新闻、文学、广播、影视作品、标语、宣传画等各类充斥于生活空间的宣传媒介,恰如其分调动民众对我们党和政府及其政策的认同、支持,激发妇女自我成就的渴望。“新中国第一位女司机田桂英”“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各方报道着重突出妇女在诸多由男性长期把持的领域实现零的突破,梁军在农村开着拖拉机车工作的场景被收录为中国人民银行第三套人民币一元面值的图案,“妇女积极分子”“巧姑娘”“红旗手”,以“刘胡兰”“花木兰”“穆桂英”等命名的妇女集体成为宣传热词,1954年到1957年,《人民日报》47次报道上海棉纺织厂劳动模范黄宝妹的先进事迹。还有一系列《劳动模范访问记》《模范妇女》《妇女英模故事》等通俗读物,小说《李双双小传》、电影《三八河边》等文艺作品面世。

这些舆论宣传激发妇女对自身命运、对投身国家建设的根本关切。1955年《中国妇女》连续发起5期“家庭妇女应如何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大讨论,1963年《中国妇女》刊登《谈革命妇女的人生观》2000多封读者来信和稿件。越来越多妇女从思想上觉醒,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经济任务的积极作用。

党和国家对妇女的荣誉表彰以选树典型、仪式、宣传构成完整闭环,以制度化和常态化存续的实践,确立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社会主义价值形态,确立关乎人民的主人翁身份的立场根基——在政治上强调阶级性,树立崇高革命理想。在经济生产战线上,建构起崇尚艰苦奋斗、乐于奉献、拼搏进取的生产劲头。配合国家中心工作,深挖妇女的强大“潜能”与“动力”,先进妇女带动起更多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成为在党领导下发展生产的伟大劳动者,成为国家建设的生产助力,在实现政治意义上“男女平权”的同时,更是要实现生活中的“男女平等”。妇女走出家庭后,在擅长的纺织工业、文化、教育、医务、保育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更在钢铁、建筑、石油等重工业行业中发挥自身能力,宝钢、武钢等企业的女职工迅速增长,从泥瓦工到设计等复杂技术活都有妇女身影。在城市,1952年后女职工数保持年增长率高于12%,到1958年女职工数已比新中国成立前增加十倍,1960年女职工数量猛增至1008.7万人。农村妇女活跃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从1957年起,从事农业生产的妇女占农村妇女总数的70%以上。^①妇女参加农业生产也

^①数据来源于《当代中国妇女》《中华人民共和国〈执行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国家报告》,转引自1995年中共中央党校人权研究中心组织编写《中国的妇女人权》一书。

释放出大量男性群体投身工业生产。也有不少妇女参加了国家的各级政权机构,学习管理国家的本领。

三、认同与责任:妇女表彰的经验启示

毋庸置疑,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妇女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妇女的力量在党和国家的多重动员下被充分调动,在农业生产互助组中、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中涌现出了大批鼓足干劲的妇女,在国防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上出现了取得各类成绩的妇女身影。作为党领导的妇女运动的组成部分,荣誉表彰很好完成肩负且被期待的使命,鼓舞并推动妇女从身体到思想全面解放,推动妇女投入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为国家变革与发展的主体力量和重要动力。究其根本,妇女表彰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行为,如何实现妇女的自觉自为,是表彰得以成功的关键。

第一,党的领导确立荣誉表彰的正确方向和价值遵循。新中国成立前,妇女往往被视为家庭的附庸和“工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妇女解放事业的根本指向,就是让妇女成为真正意义的人参与社会生活。恩格斯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2](p.66)}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新中国建设的需求指明了妇女解放的坦途——以个人劳动投入公共建设事业,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党和国家有意识地“团结、教育、组织妇女”,在贯彻男女平等政策、依法依规保障各项妇女权利的同时,给妇女运动加一把力。国家既表彰人,更表彰事,妇女承载着被人格化的国家意志。通过表彰先进妇

女,树立思想进步、勤劳能干、奋发有为的劳动妇女典型,发挥了她们的“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18](pp.935,1014)}突出社会主义妇女的“劳动光荣”话语,表现出她们独立自主、自尊自信,特别是在劳动中的坚强气魄,成为对最广大妇女的气质“引领”,掀起学习模范、创优争先的热潮。第一代纺织女模范黄宝妹说:“旧社会劳动为吃饭,新社会劳动最光荣”是她最深刻的体会。在新社会中只要劳动做出了一些成绩,党和政府就会肯定、奖励和培养。^{[16](p.34)}妇女模范通过劳动升华自身,在党和国家引领下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新人,同时又肩负起历史使命,号召更广大妇女走上劳动解放的道路。全国妇联主办的刊物《中国妇女》的卷首语勾勒出社会主义妇女的先进模样:听党话,立下大志学英雄;勤劳作,积极支援大跃进;找窍门,搞改革,生产大提高;经典细算每分钱,光景好无边。^[19]妇女在劳动号召下,构成社会和家庭的不同面向,把自己的身体和精神融入新集体,通过对自己权益的争取,从过去的局限中解脱出来,获取知识、改变社会身份地位、提升经济地位。

第二,妇女表彰成功的关键在于唤醒妇女的主体意识。举办全国妇女表彰大会,树立了众多先进妇女榜样,如上海的裔式媚、山西的申纪兰、湖南的杨玉翠、甘肃的樊秀才等,这些妇女模范一贯坚持拥护党的领导,一贯在生产上带头,敢于突破自我,在实现经济独立的基础上更实现人格独立,从思想上鼓舞更多女性投身劳动生产,积极提高技术。妇女从家庭私人领域进入社会集体场域,从家务劳作到生产建设,这是不同以往的全新体验,激发了她们投身劳动的更大积极性。“翻身”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荣誉表彰能够带来的物质与精神双重感

受。在国家荣誉表彰中呈现出妇女劳动是受人尊敬的价值导向。新世界、新生活的新鲜感受和被认同、被肯定,是精神世界充实感的来源,进一步激发她们投身集体生活的更大积极性。在模范带动示范下,在经历过新中国扫盲运动、受过教育的勤学、勤问、勤思考的妇女新人眼前呈现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宏大画卷,是未曾想象过的家庭之外的新天地。从受助到自助再到助人,这些榜样示范激励着广大妇女主动学习、互相帮助与自我革新。《光明日报》曾转载过女拖拉机手梁军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其中这样写道,“要树立了‘劳动第一’的观念,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自己的努力下,能够过上这么好的生活,今后也一定会好好干。再苦再累都是自己的财富。通过自己的努力必将获得收获”。^[20]妇女回归社会,回到劳动人民中去,不再是抛头露面的羞辱。妇女活动空间改变的同时,也改变了其内容、感受和与之相关的荣誉,从而进一步认识到自身价值,认可自己作为人的角色而不是作为工具的角色,既会生产、工作,又会管理、安排家务的能手成为当时先进妇女的风向标。^{[21](p.12)}

第三,荣誉表彰触发了个人价值与国家发展的紧密联系。在新中国,劳动的意义不再是谋生,经由劳动,妇女成为建设国家的主人翁。国家对先进妇女精神鼓舞与物质奖励的表彰做法,证明个体的奋斗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在共同劳动中构建起党和国家的深切情感,极大提升了妇女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在妇女表彰的政治场域下,进一步放大了这种责无旁贷的“光荣感”“使命感”“责任感”,以及被国家需要而为之奋斗的冲劲。国家对妇女的荣誉表彰唤起的不仅是对优秀人物、事迹的

效仿,更是激起社会的价值意识:肯定、敬仰和向往。政治理想已然超脱于个人对荣誉的渴望,将自己构想成国家理想公民的形象。为国家奉献、舍我其谁的情怀与责任激励他们共同奋进在社会主义建设大道上。在收听盛大的1960年全国三八红旗手(集体)表彰大会后,湖北省安陆县青龙公社的三百多名红霞姑娘,提早准备春风工作,改进创造了多种工具,赶修了一个发电站;陕西渭南县妇女决心要高举棉花丰收的大旗,大战三百天,实现亩产皮棉二百斤;甘肃庆阳妇女立雄心,誓减干旱保丰收。河南新乡洪门公社妇女千方百计找水源,誓夺小麦丰收关;广州归国华侨积极参加抗旱春耕和养猪意外,大搞热带作物和高产试验,培养菠萝王和高产玫瑰花……她们有一颗想要改变祖国面貌的火热的心,完全将社会主义建设内化为自己的事情,为创造社会主义社会而劳动。毫无保留地把自己身体与精神共同献给新生的祖国。如果能够用先进技术、先进工作方法把生产做得更多、更好、更快、更省,那么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可以更快前进。当妇女的劳动激情和人生理想一旦被点燃,当作为星星之火的个人力量聚成一团,就可以形成燎原之势。

党和国家的妇女表彰紧紧围绕新中国建设的中心任务,聚焦特定的妇女群体,这些先进妇女由过去被轻视、被剥削压迫的角色转变为人人称羨的“英雄”“模范”。在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中,广大被压迫的妇女从不能言语的附庸转变为平等相待的主人。她们“不仅在劳动生产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甚至创造了奇迹,而且在促进妇女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和妇女劳动潜力的进一步发掘方面发挥不可磨灭的

作用”。^[22]她们对理想事业的追求,社会责任、“主人翁”意识等,都激励妇女群体不断进步,不计个人得失发挥个人潜力。妇女表彰塑造并维护党和人民伟大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她们热爱祖国、热爱党,发奋学习、大胆拼搏,一心奉献,勤劳俭朴。作为生产者,她们感恩脱胎换骨的新生活;作为建设者,自豪于改天换地的劳动成果;作为新时代女性,挣脱夫权、父权、族权、神权的压迫,她们个体命运和国家深度捆绑。通过表彰,妇女的能力、成就和贡献被广泛宣传和认可,建构起亲密的情感关联。经由表彰,妇女劳动能力和潜力被重新认识和评价,唤醒更多妇女的内在自觉,继而升华为“为国奋斗”的理想。荣誉表彰恰如其分地与妇女的认知、情感、价值实现双向深度塑造效应,最终内化为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外化为积极参与建设的行动。荣誉表彰加速推进了更大范围内对广大妇女的改造。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妇女表彰实践清晰呈现了荣誉表彰发挥作用的关键逻辑:荣誉表彰架起了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桥梁,表彰传递的政治态度和价值取向蕴含了改变个人行为与思想认识的潜能;当表彰与社会价值和期待有效对接,促进了社会成员对国家和执政党的认同,激发了社会成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主动的实践就得以形成,最终汇聚起建设国家的磅礴力量。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为《新中国妇女》杂志的题词[J].新中国妇女,1949,(1).
-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 [4]全国妇联妇运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7—1937)[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3.
- [5]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6]陈云文选(1949—1956)[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7]中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陕西省妇女联合会研究室编.中国妇女统计资料[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
- [8]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9]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中国妇女运动百年大事记(1901—2000)[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3.
- [10]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妇女解放问题文选(1938—1987)[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 [11]黄利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妇女工作思想与实践[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8,(4).
- [12]李静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 [13]全国妇联为在“三八”五十周年表扬“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给省、市、自治区妇联的通知[J].妇女工作,1960,(3).
- [14]劳模代表会议末次会议 李立三作总结报告并进行给奖[N].新华社,1950-10-03.
- [15]上海市妇女联合会,新民周刊社编.女神的模样:改革开放40年40位三八红旗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 [16]刘文编.时代领跑者——上海劳模口述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 [17]贯彻劳模大会精神 全国劳模大会上海代表感言[N].解放日报,1950-10-15.
- [18]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9]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卷首语[J].中国妇女,1960,(1).
- [20]女拖拉机手写给毛主席的信[N].光明日报,1950-10-02.
- [21]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编.新中国妇女运动概况[M].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1951.
- [22]各路女英雄会师北京全国妇联十一月召开妇女积极分子代表会议[N].人民日报,1958-08-23.

责任编辑:图 图

helpful to further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rich content and essence of Capital and to analyze, study and solve the problem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form in the process of advanc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Yan Man-li)

The Early Presence of the CPC's Central Organs in Shanghai: A Historical-Spatial Survey: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to the beginning of 1933, the central organs of the Party were stationed in Shanghai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and the CPC actively analyzed and utilized the unique historical space of Shanghai to lead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movement. Shanghai in modern times was a hub for disseminating Marxism and a stronghold of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The urban space of "one center with four concessions" shaped a special pattern, and the three-dimensional transportation network facilitated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mmunication. The transfer between cities highlighted the differences in location, realizing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f time and space in the process of proactive response. The CPC made full use of the "timing" and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of Shanghai, the earliest location of the Party's Central Committee, to carry out its work, refine its party members, and promote its organizational system and scale. The CPC accumulated valuable experience in urban work. Through systematically analyzing and grasping the conditions and law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CPC further enhanced its historical initiative, opened up a new space for revolution, initiated the Chinese practice of "exchanging time for space," and led the strategic direct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t a deeper level. (Zhang Yong-jie)

Commending and Mobilizing Women in the Early Period of New China: In the early years of New China, the CPC and the government, through commending prominent women, encouraged more women to move from family to society, so as to explore and stimulate their "potential" and "motivation". This commendation mechanism, with labor as its core orientation, encompassed model women selection, ceremonial recognition, and publicity, which constitutes an effective closed loop of incentives. The honorary recognition not only effectively stimulates the profound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value recognition of "glorious labor" among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women, but also awakens their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This prompts them to closely integrate their personal struggles with national construction, transform their personal recognition of "struggling for the country" into positive actions, and advance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realizing their own liberation. (Zhang Yan-qing)

Localizing Marxism in China to End the Cultural Crisis out of Westernization and Retroism: A Historical Reflec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re was a serious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cultural revivalists and the westernizers who worshipped Western culture. Both factions went into decline, as severely challenged by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In essence, the two seemingly opposing schools of thought were both dogmatic: the former regarded traditional culture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 and adhered to the "old dogmas and stereotypes" with the imprint of feudalism, while the latter was obsessed with the "foreign dogmas and stereotypes" of the West. Inheriting the spirit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Chinese Communists, by opposing dogmatism, thoroughly solved the problem of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in the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circles during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s localized Marx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new democratic culture comprehensively transcends the cultural revivalists and westernizers. Adapting Marxism to 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 and it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implies the triple meanings of mastering the bes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dialectically analyzing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ransforming and sublimating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is an effective way to localize Marxism in China. (Wang Xiao-feng)

Mao Ze-dong and Qu Verse: Mao Ze-dong's relationship with Qu, a type of verse popular in the Yuan Dynasty, deserves careful exploration. Throughout his life, Mao enjoyed reading Qu, discussing Qu, transcribing Qu, utilizing Qu, and helping others modify their Qu verses. He also wrote Qu verses, but they were not published. Exploring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in which Mao Ze-dong read Qu, his resources of Qu books, and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Mao Ze-dong's engaging with, studying, appreciating, discussing, transcribing, utilizing, and writing Qu, in addition to his helping others modify their Qu verses, not only broadens our understanding of Mao Ze-dong's fondness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which includes Qu, but also deepens our comprehension of Mao Ze-dong as a great poet in a fuller way. There are few referential details to demonstrate what Qu books Mao Ze-dong read or what Qu verses he even composed before the year of 1949. The first written records of Mao's reading Qu are from 1949, namely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earliest record of Mao Ze-dong's discussing Qu is that with Liu Ying about Chen Quan's "A Chattering Song", a metrical tune in Qu, and his most frequent discussions involve the Qu verses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nd *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Chamber*. Mao Ze-dong was good at utilizing Qu. He not only read Qu as a group of in-depth thinking and analogical argument, but also applied the verses to persuade others and solve problems in special occasions through metaphorically enriching the texts that were relevant to specific situations or persons. (Hu Wei-xiong)

Mao Ze-dong's Thesis on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t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and Achievement: The CPC members, mainly represented by Comrade Mao Ze-dong, took root in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hich lasts for more than 5,000 years,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Marxism, and creatively put forward the idea that "the future of agriculture fundamentally lies in mechaniz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onditions of the country, the Party, and the agriculture. The thought provides a correct guideline to developing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n China. Mao Ze-dong's thesis on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went through the stages of germination,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his understanding showed a spiral-upward trend, as it was gradually deepening. Under this guidance,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n China has been improving and optimized,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has been gradually raised, the traditional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has been transformed, and the team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talents has been cultivated and strengthened. Mao Ze-dong's thesis on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s a valuable spiritual wealth of our Party. We should accurately understand it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so as to realiz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n the new journey towards comprehensively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power. (Huang Yu-xi, Peng Chao)

(翻译:张剑锋)